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九期 ——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2a)

【林案追踪】	2 5 6 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于鹏飞
【书刊评论】	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	丁凯文·司马清扬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二)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林案追踪】

2 5 6 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 于鹏飞 •

今年《炎黄春秋》第 10 期上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的发表，立即引发丁凯文、余汝信等史学家对于 2 5 6 坠机事件的再议。顾大寿的回忆并不象期待的那样详实，反而象一位上了岁数的老人在讲故事，许多细节是模糊的，一笔带过，只剩下轮廓。但阎文毕竟为我们揭开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谜底，使得几十年来沸沸扬扬的传说变成真相。细节能够决定历史，笔者也愿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盘托与世人。

细节一：2 5 6 飞机在 9 · 1 2 晚上确实发生了故障

据吴法宪回忆，9 月 1 2 晚上 11 点左右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追查山海关机场 2 5 6 号的下落。吴先问过时念堂，紧接着找到胡萍。在确认情况属实后，“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他的答复却令吴十分悻悻——“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1998 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刊登了周恩来卫士高振普“‘九一三’事件 50 小时内的周恩来”的文章，回忆吴向周恩来报告说，胡萍告诉他“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这是胡萍对吴的搪塞之词。而据当年由林立果自己挑选并带在身边的女青年小张和另一位刚刚调来照顾林生活的女青年小

袁回忆，256飞机那天确实曾经发生过故障。

本来林立果要她们准备明天一早从北京去广州的，所以9月12一天她们都在平静中度过。傍晚林立果临时通知她们跟他一起飞赴山海关，再从那里去广州。晚饭时分，她们跟随林立果、刘沛丰和程洪珍一起行色匆匆上了256飞机，林、刘、程三人坐在一起，她们坐在空勤服务区边上的舱位，与林相互看不见，只能看到服务员小魏操作。

康庭梓说，256飞机是当晚七点四十分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的。张、袁回忆：升空后不知什么原因飞机突然倾斜，机身明显在摇摆，同时声音非常大，服务操作台上的茶杯暖瓶等物品乒乒乓乓倒下，张和袁很惊慌，一边尽力保持身体平衡一边帮小魏把东西扶好。这时听见刘沛丰在那边问了句“怎么回事？”但没见人出来。几分钟后，飞机恢复了平稳，声音也小了下去。小魏告诉她们：刚才是起落架有问题，怎么也收不起来了，现在没事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安全落地，林立果下了飞机。临去北戴河前嘱咐她们俩在飞机上等待，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不要下飞机，就在这上面等着我，我回来马上就走（笔者注：指去广州）”。并安排程洪珍留下陪着她们。林走后，机组人员过来请她们下飞机，她们说：首长让我们在这等。机组人员解释说：刚才来的时候起落架有故障，我们要检修飞机。他们三个只好下来，到食堂去吃晚饭了。此时应该是八点多。

康庭梓在“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杂志1999年第4期 页34）一文中没有关于起落架故障的任何记载。但康说“当晚11点前，潘景寅作为一机之长，在机组会上还为第二天的飞行工作做了时间上的安排”，而且“10点40分我和领航员关窗睡觉”了。胡答复吴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机组已经休息，如果飞机确实检修了，应该是在开机组会之前这段时间完成的。所以胡萍对吴法宪说飞机“正在检修”，显见有虚。

九点多钟，潘景寅在山海关接到过胡萍的电话，他是否报告了起落架的故障？《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明晓、赤男著，页444）作者称：潘景寅只在胡萍嘱咐他——“如果有人问是谁安排的，就说是你自己安排；如果问为什么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回不来”这些话之后应了一句“明白”。如果这段情况属实，则证明“故障”是胡萍为了让飞机继续留在山海关的托词。这绝对是一个巧合。否则如果真有故障，胡萍肯定会立即安排替换256飞机，以保障林立果原定9·13的计划得以实施。但此后胡萍继续留在西郊机场指挥，在吴法宪到来之前并没有采取其它措施，更说明“发动机故障”一说的真假，他心里有数。很明显，“发动机故障”比起“起落架故障”使得256飞机回不了北京的理由更加充分，而“正在检修”让256飞机留在山海关机场的时间也就更加充足。

吴法宪在获悉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之后让秘书找到潘景寅，这个时间肯定在胡与潘通话之后，电话里他没有核实是否“故障”，说明吴法宪没有怀疑胡萍以及“故障”有假，他当然也不知道胡和潘已经统一了口径。

后来256强行起飞时的完美升空，证明发动机没有问题。

孙一先在《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九章里用大量篇幅描写坠机现场，有两处提到了起落架：第一次是孙在现场看到“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的草地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在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面未燃烧的草丛中”；第二次是在9月16号再去现场补拍照片时，孙又“到二百米以外的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飞机迫降时起落架是不需要放下的，根据现场可以推测256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

后的起落架并无故障，否则迫降现场就不是人们看到的那样，轮胎也不会那样完好无损。胡萍肯定没料到当初他那句用来搪塞吴法宪的话竟成了256飞机命运的预言。

细节二：256飞机被击中的情报是夜已报到空军指挥所

顾大寿回忆录揭秘256飞机被蒙古击落其实并不令人诧异，因为9月13日那天凌晨起，空军的情报系统就监听到了外电反应，并及时向首脑机关报告。256飞机强行起飞之后，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被电话从家里叫到空军指挥所，当时在场的其他领导还有李德生、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王飞和白云等人。

据贺回忆，256飞机起飞以后的的情报，是他们部驻扎在张家口一带的技侦八团侦听到的。9月13日凌晨最先上报的“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紧接着是“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之后又报了“发动机空中起火”，最后是“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

在舒云“百问九一三”的博文中，也多处提到256飞机起飞以后的动向。

据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256三叉戟出去后，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蒙古边防部队向上报告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肉眼看空中一团火，空中着火。

另据原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回忆：9月12日是我在指挥所值班。……天不亮，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记功。

又据总参某部情报室主任佟长仁回忆：9月13日凌晨，值班员叫我去，向我报告，……值班员并不了解是林彪的专机，只知道蒙古境内有架飞机坠落，不是咱们雷达亲眼看的，通过其地面反映出来的。佟长仁这里所说的“地面”，应该是指我军的情报系统。

他们对当夜的回忆肯定来自于我军的情报系统。

“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的提法象是蒙方雷达部队。顾大寿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侦察机”。

“发动机空中起火”很象空中的视角，换句话说，极有可能是拦截256飞机的飞行员在完成的任务后给地面指挥的报告，因为再大的飞机在雷达仪表上里也只是一个绿色的光点，另外当时大部分的飞机发动机都吊挂在机翼下面，发动机在尾部的机型极少，尽管低空飞行，离地毕竟3000公尺左右，且是晚上，就算远远判断出了哪里起火，但从地面靠目测就能判断起火部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型目标着火了，掉下来了”应该是蒙方地面观察空中的视角。

因此将这几个视角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前后的呼应关系。如果“发动机空中起火”的视角的确和猜测的一样，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拦截飞机瞄准这个“大型目标”尾部的这一攻击是致命的，是要将其击落。

贺德全讲，当得知飞机坠落的消息时，大家都不明白飞机是怎么下来的，搞不清楚；据空

军、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反复查了256飞行的沿线有没有导弹、防空部队。因为温都尔汗离坠机地点也就60公里，在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八团还上报了一些具体情况。据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说：在256三叉戟建立的这条航线上，没有设置地对空导弹部队。这些同余汝信在《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一文中“中方所掌握的苏军资料中，未有提及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旅部署”的介绍情况相似。

王飞还记得当晚技侦八团报上来的情报是抄写在纸条上的。贺德全把陆续报上来的条子拿给他们看，在场的人都传看了。王飞看了以后内心非常吃惊和不安，并隐隐感到不安，他知道林彪在北戴河，这几天以来发生的事情令他心力交瘁，但碍于在场的人多，出于一贯的慎重和严谨，当时并未与贺交谈，只能以眼神交流一下焦虑和担忧。纸条随后被丢进了指挥所的纸篓里，从此这些情报就象没有出现过一样，不仅李际泰、梁璞等空军专家们在分析坠机事件时未加以考虑，中央对坠机事件定性时也同样对此置若罔闻。

9月14号贺德全又在指挥所见到了李德生，李对昨晚空军情报部的工作印象深刻，非常满意，夸奖贺“你这个情报真厉害！”李德生的褒奖显然与白云所说的“技侦八团因此记功”一说相对应。顾大寿的回忆虽然缺少细节的描述，但佐证了9·13凌晨空军技侦八团截获外方情报的准确。这样，无论是蒙方在处理坠机事件的种种表现，还是苏方早于中方到达现场拆走发动机的举动，都基本得到了合理的解答：无论是苏方或蒙方，其实都是在掩盖和转移256飞机坠落的责任证据。

顾大寿称他去蒙古坠机现场是苏联外交部要他在死者中确认有没有林彪的尸体。虽然他没说具体时间，但估计离坠机时间不会很久。因为据王维国长子王大章讲，他听说就在913之后没几天“814（卫星接收站）”已经有人监听到苏联怀疑林彪在失事的飞机上，该同志根本不相信，没上报，后来“814”就查是谁，这人最后还受了批评。

回望这段外交事件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在《大漠那边》第八章里——当孙一先在空中看到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东南的苏军机场时，“突然想到在温都尔汗坠落的中国飞机，会不会是被这里的歼击机打下来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片幻影：浩瀚的蒙古戈壁草原上空，飞着一只迷失方向的中国飞机，几架苏联的歼击机追逐着它，迫它着陆，它倔强地挣扎着摆正航向，企图飞回祖国，突然响起一片爆炸声，中国飞机带着一团烈火，无望的坠落下去……”这段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来的幻景，在顾大寿揭秘256飞机坠毁原因之后，居然有可能是真的。

细节三：256飞机发动机被击中的证据

首先，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顾大寿文章中解密了256飞机是被击落的。既然是被击落的，就应该有被击中的部位；其次，就是当年空军技侦八团的情报；再有就是从坠毁的飞机上寻找答案。孙一先的书无意中对坠机现场的发动机多有描述。

“首先看到的是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
在那截折断的机翼旁边，“看到炸断的发动机尾端喷口”；

“我和小沈赶忙奔向被炸断的机尾，……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下一截发动机的外壳与尾部相连。……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十八米处，有一个外壳被大部分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式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

“在中国大使馆人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

“三叉戟256号上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由于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都在其尾部，所以孙对机尾的描述也间接反映了飞机发动机坠落后的状况——“机尾被远远抛到了机头的右后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来一瞬间甩开来的，……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甩的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

机尾和机身炸开的事实，中方在现场看到了，“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而发动机就在机尾。苏联人拆走的正是位于中间的主发动机。孙在现场看到的三台发动机中的另外两台——“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虽然孙没有对其进一步描述，但可以推理没有描述就是完好，否则不会遗漏。如果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完好，那么拆走的那台一定是被击中的。那些在机尾处裸露着的各式各样的电线和裸露的线芯，很可能就是中间发动机被拆走以后留下的，因为“黑匣子”虽在机尾，但不大会由“一大堆”电线相连。

从书里看得出其实蒙方很心虚，但中方似乎比对方更虚，蒙方对飞机失事的原因非常清楚，却始终坚持256飞机是“不明原因坠毁”，明显想逃避责任；双方都有理亏的地方，都象做了“贼”，都怕，中方则怕的更多。“坠毁”一说的“坠”字就颇含深意——“坠”就不是降，可以说蒙方起码不否认256飞机在空中就出了问题，因此而“坠”，它非正常降落，甚至不是正常的迫降，“毁”则是结果，可惜中方根本没有明白这一暗示的弦外之音。

细节四：256飞机坠毁后的勘验

如果是迫降时飞机腹部摩擦起火引发油箱着火爆炸，应该首先在起火的部位炸开，为什么“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呢？顾大寿的文章使我们不妨更加大胆地设想——256飞机很可能发生了两次大火和不止一次的爆炸：第一次是机尾的发动机在空中被击中着火、后来爆炸，所以机尾离机身残骸较远；第二次可能是飞机迫降时腹部摩擦起火、机身爆炸，还有可能第一次的爆炸引发了机身着火、爆炸。总之由于坠地后的火势更猛烈，很可能将第一次的爆炸和着火的痕迹毁掉了。256飞机的燃油未尽，哪怕附近没有机场，潘景寅一定不会忘记把油耗尽再迫降的。唯独主发动机被击中了时，他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冒险迫降。

孙一先和小王以能否找到飞机在空中着火落下的燃烧物来甄别飞机在降落前是否着了火，显然是缺乏经验的。试想飞机的发动机与机尾是一个整体，即使被击中着火，可能不会马上脱落，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燃烧物落到地上。已知256飞机不是在坠机现场上空被击中的，所以即使有碎片落下，也会落在他处。显然不能将飞机被击中的空域与坠落地点混淆为一谈。

由于蒙方想对“坠机”赖帐，实际上对中方采取了蒙混的态度，所以我方看到的所谓坠机现场，不过是经过苏蒙“伪装”过的现场罢了——什物是被收集起来了，航行图被拿走了，鞋子被归拢了，枪支被集中了，箱子被搬走了……发动机和黑匣子都被苏联人拆走了，中方不知道有黑匣子所以没有问及，蒙方就只告诉中方苏联拆走了发动机；在坠机现场中方注意到尸体都没有戴手表，经询问蒙方才承认“在草地上检了九块手表”。表面上看现场任由我方勘验，却连手表这种小事蒙方都不主动告知，何况其他？

刘沛丰和程洪珍登机时，每人都拎了两只鼓鼓的皮包，他俩都是随身携带。程洪珍没上飞机，刘沛丰上了，尸体的皮带都尚未烧尽，皮包就一点不剩？林立果从毛家湾搬来的二十多只箱子，都装上飞机堆放在后舱，张和袁在北京帮林立果收拾箱子时，看见过整箱的美元和满箱子的名贵手表，有劳力士和欧米茄，现场却一只箱子也没有。蒙方承认拣的九块手表，也不给中方过目，反正与九具尸体的数目相符。张、袁当时都是战士，一人一只极为简单旅行袋，服务员小魏也没带行李，看来那些散落的女鞋应该都是叶群的。

顾大寿称“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

武器。”孙一先对现场则这样描写：“子弹散乱的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顾大寿口气很肯定，却没说明具体位置，而孙是对现象的估计，令人不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场的几把手枪也不奇怪。小张和小袁回忆：被机组人员请下了飞机，晚饭后程把她们安置在机场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休息，这时他从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两把手枪递给她们，说现在形势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保卫林副主席和林副部长。你们自己也要多加小心，给你们一人一把枪，必要的时候防身用。她们并未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嘻嘻哈哈地把枪接过来，放在各自随身背的挎包里。这说明林立果等人携带的不止每人一把的武器，所以枪的数目可能比人数多。

在现场蒙方告知许大使法医可以勘验了，许竟擅自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予以谢绝，错过了非常重要取证机会。否则，我们就能进一步了解死者最后的情况，起码知道他们的死亡原因：烧伤、外伤、亦或外伤烧伤兼而有之？呼吸道里面是否吸入了火场的烟灰？指甲缝里有没有生前搏斗的残留物？他们身上是否中弹？他们的年龄？各自分别是谁？……。

李德生当年在空军指挥所不断用电话将飞机的高位置、方向报告周恩来，不可能不报情报。弹有弹道，炮有炮洞，256飞机恰好是“发动机空中起火”，偏偏现场就缺失主发动机和“黑匣子”，蒙方象“曾参杀人”一样不断重复的“不明原因的故障，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结论，也随着照片带回国内，直至写入中央文件。“9·13事件”令世界哗然、举国震惊，空军上下哀鸿遍野；那里曾高调款待越南叛逃者的黄文欢，这里却“对我使馆人员对坟前默哀的照片看也不看，对死者的照片看时的姿态和表情象是欣赏和满意”；当年的结论没有参照情报加以考虑，坠机现场缺失主要证据，疑点不能一一获释，遗体被遗弃，勘验无异纸上谈兵……当年“短平快”难以服众，今日有真相浮出，终于笑柄千秋。

细节五：256飞机机长潘景寅的选择

在256飞机的坠机事件中，最神秘难解的人物其实是机长潘景寅——他指使给256飞机加上比北京飞山海关更多的油量；他同意胡萍的“故障”一说并与胡统一口径；他满口答应吴法宪“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却未执行；他彻夜未眠忠诚地守候在山海关调度室电话旁；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林立果的命令；他聪明地只挑选三个机械师帮助自己强行起飞；他在空中用缓慢的航迹表明了他选择的航向；他犹如平日一般沉默始终没有打开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话系统；他决定带油迫降；他死时双手高举……

在吴法宪和林彪面前，潘景寅当然听林彪的，甚至就是在吴法宪和胡萍面前，他也选择没听吴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空军盛传吴法宪犯了路线错误，吴的威望与林立果“讲用报告”在空军的影响正好形成剪刀差，随着“两个一切”的流传，林立果的话吴司令员都听，空军谁不听？

在这个事件中，隐隐有条“一航校”的轨迹显现，比如周宇驰、潘景寅、尚登峨都曾在一航校工作学习过，追寻过去，潘与周竟有更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四野九纵138师413团整个团的直属机关奉命调到哈尔滨组建空军一航校。笔者从一本被保存了六十年的花名册里，看到了金培（即周宇驰一笔者注）和潘景寅的名字，特抄录如下：

原队别 宣传股，原职别 宣传干事，姓名 金培，年龄 22，文化程度 初中毕业，出身 学生、贫农，1946.10入伍，1946.2入党，准备做何工作 秘书，现在级别 付（副一笔者注）连级，备考 营部当干事。

原队别 参谋处，原职别 见习侦查参谋，姓名 潘景寅（寅一笔者注），年龄 22，文化程度 四年，出身 学生、中（农一笔者注），1946.6入伍，1947.9入党，准备做何工作 原职，现在级别 排级，备考 侦察股学习。

后来周在一航校宣传科工作九年，潘景寅则在那里学了飞行。象所有浴血奋战过的人一样他们彼此了解、有一定的感情，在和平年代里和原来的首长、战友保持着联系，保持着友谊。

解放战争时还是警卫员的潘景寅就曾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首长，后来积极要求去战斗第一线的他，如愿以偿地调到了侦查处。性格的寡言使他爱闷头抽烟。至今没有他参与林立果一系列策划活动的任何证据，包括看过所谓的“林彪手令”的证据，但在山海关机场他表现得比那些看过“手令”的人都坚定，林立果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让他毫不犹豫的将吴法宪的命令抛在脑后，在叶群的喊叫下，义无反顾操作飞机强行起飞。谁说潘景寅最后的选择不是理智的、勇敢的、革命的、军人的以及英雄主义的？即使最后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依然选择了履行机长的责任。

细节决定历史，历史需要真实，我们期待更多的历史事实披露出来，逐渐将256飞机的坠毁事件完整呈现。

~~~~~

## 【书刊评论】

### 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

·丁凯文·司马清扬·

今年9月份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李德与舒云编纂的《林彪日记》（明镜出版社2009年9月版，以下简称《日记》），这是海外首次出版的林彪元帅的年谱，是海内外研究林彪一生不可多得资料。全书1227页，共约120余万字，工程浩大。作者千辛万苦，历经二十多年时间方始完成，令人由衷起敬。众所周知，国内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成专门小组负责编纂了传记和年谱，他们可以享受很多的特权，如利用国内的相关档案，尤其是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走访相关的当事人，查阅国内外各种报刊资料等等。而林彪是被当局打倒的“反面人物”，不仅相关的研究极为匮乏，其传记和年谱更是付之阙如，举凡涉及林彪的那些书籍或文章也大都按照官方的宣传口径处处予以贬低、批判，鲜少实事求是的客观论述。由此，李德与舒云编纂的这部林彪年谱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 ◇ 全面、完整的介绍

要做到全面、完整地介绍林彪元帅的一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是极为不易的。一来有关林彪一生的资料在“九一三事件”后被全面封锁，世间能看到的多是官方的批判性资料，不少内容被人为地夸大、剪裁或篡改、歪曲，而鲜少有研究者在这方面下功夫，故能发掘的资料不易找到，更不用说那些保留在中央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了；二是林彪的性格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一派军人的风格，即使是很熟悉的同级或下级交往也不多。这种不事张扬的性格给予外界的了解就极为有限了。虽说战争年代林彪的相关资料人们尚能收集到一些，但是一些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资料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的资料，抗战期间林彪赴重庆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等。另外，中共建国后林彪曾一度患病严重，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故这方

面的资料就少之又少了，而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对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着杰出的贡献，却也因为林彪的倒台而被一笔抹煞。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全面、完整地收集林彪的历史资料就显得困难重重。李德与舒云两位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林彪的年谱从林彪出生开始写起，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可以说该书事无巨细，全面记载了林彪从一名革命军中的普通指挥员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的光辉的历程，再现了林彪建国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很多重要经历，还原了那段被官方长期以来扭曲的历史。

举例来说，《林彪日记》对于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作了更正。林彪在1959年的何时上的庐山，作者提供的日期显然更合乎实情。作者提出林彪是在7月25日上的庐山。（见《日记》下册698页）此事可以由《聂荣臻年谱》记载的聂到林彪处谈工作予以印证，而且林彪并没有参加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由此可以判定林彪不可能在23日之前到达庐山。（《聂荣臻年谱》下册682页）而李锐先生在其著作《庐山会议实录》中借周恩来的口说林彪是7月17日上山，则明显有误，这显然是同李锐认为的林彪在庐山批彭的“几句话，就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相得益彰的。（《庐山会议实录》226—227、285页）换句话说，不少人由此而认为林彪在庐山所起的作用似乎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刘少奇这几位党内的真正掌权者。李锐先生的回忆录是在庐山会议多年之后问世的，所以在具体日期上的记忆有可能存在某些偏差，但是这类偏差恰恰成为目前国内史学界由此批林的来源和根据。另外，关于1951年林彪何时从苏联回国一事，作者提出林彪是6月份回国而非传统上所说的10月份。（见《日记》下册680页）作者提到“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来往电报推断，时间应该是在6月18日。依据笔者手头上的资料，作者提供的这个日期是相当准确的。在《毛泽东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9日）中提到：“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1951年6月10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说明此时的林彪尚在苏联。在《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中提到：“致毛泽东同志：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而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则分别为高岗、金日成。此二人在《请求接见问题给斯大林的信》（1951年6月14日）中提到“约·维·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收到毛泽东同志的复电。请收下，而且如果时间允许，请您今天就接见我们。我们迫切请求给予我们这种崇高的荣誉。这样我们就能明天启程去根据您的指示解决所有问题。”这封信表明高岗等人是预计6月15日启程回国。随后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援助武器装备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21日）中说：“1、高岗同志回来转达了您对各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电报来源：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此电报表明高岗已经回到国内。笔者推测林彪很可能参与高岗与斯大林会谈后与高岗一起回国的，具体时间根据高岗给斯大林的电报应该是6月15日动身一起回国的，再加上路途所耗时间，18日回国是合情合理的。而此事亦有林彪的秘书谭云鹤所证实。谭回忆道林彪从苏联“养病”回来，“舞迷”高岗通知我到东北交际处舞厅见林彪。（《见证历史：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时代》175页。笔者注：谭将此事误记为1952年夏）而且林彪接见的十三兵团部分师级领导的回国也是在1951年6月份。（吴瑞林《我向毛主席汇报抗美援朝战况》，载《军事历史》2005年第4期）

#### ◇ 考证细致、资料详实

完成一部上百万字的林彪年谱，必须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寻找历史资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林彪日记》的作者以二十多年的时间搜寻了大量相关的文档、数百种有关书籍和报刊杂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务必使该年谱持之有据，真正做到了严谨和求实。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言“凡书中写到的历史事件、作战行动，请示报告、军事思想等重大问题，都坚持以确凿可靠的资料为依据”，“凡涉及野史、演义之类描述林彪生平的说法一律不予采用。”为何我



们必须强调相关资料必须真实可信？盖因坊间流传的有关林彪的书籍秉承官方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按照当局定好的调子着意丑化林彪，其中代表性的书籍就有国内出版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林青山的《林彪传》、以及香港出版的辛子陵的《林彪正传》、温相的《晚年林彪》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曲解历史，充当官方的喉舌和传声筒，其编造历史、篡改史实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故其史料价值极低。但因有了官方的支持，这类“戏说”或曰“纪实文学”却能横行于市，蛊惑人心，长此以往就起到以讹传讹、歪曲历史之功效。然而，严肃之史家对此类坊间野史也很难做到一一予以辨析，就如同文革史方面的国内造假专家师东兵，虽出版大量伪史访谈录，但是真正的史家却基本不予以关注，由其自生自灭，如非其人过于张扬，引发众怒而受到谴责，随后还锒铛入狱，恐怕该人还会继续其造假专业而乐此不疲。我们鄙夷这些伪史、伪作，故我们必须大力提倡严肃认真的治史原则，作到细致的考证，资料的详实、准确。举例来说，对于林彪和遵义会议的关系，作者对长期以来的说法用确切的材料加以推翻。例如作为林彪军事上长期的搭档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说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作者提出：“林彪即席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重申他的观点，批评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因指挥失当而贻误战机的战例。林彪列举温坊战役未执行中革军委错误的作战方针，而坚持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正确。”（见《日记》上册110页）这些可以由前共产国际驻华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加以印证。《日记》作者李德先生和舒云女士的确做到了细致的考证，令笔者肃然起敬。

◇ 不少资料极为珍贵，有些是首次披露

举例来说，1942年5月林彪为了悼念牺牲疆场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写下了一首长诗，该诗以“凌霄”的谐音笔名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林彪唯一一首长诗。（见《日记》上册249—251页）这首诗充满了对自己战友的深沉的情感，回顾了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艰难困苦和浴血奋战的英勇经历，沉痛地悼念战友不幸的离去，同时也抒发了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林彪平时不善言辞，但是这首诗却体现出林彪作为一位常年驰骋疆场的猛士内心深处的铁血柔情和博大情怀。

关于林彪在苏联养伤的经历过去少为人知，特别是林彪对于“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对苏联进攻路线的准确判断。作者提到“1940年9月，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大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林彪则不这么认为。作者提到：“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高加索方向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全线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乌克兰，但不幸被林彪言中。”（见《日记》上册243页）显而易见，林彪否定了“先攻占乌克兰”一说，而强调德国将全线进攻，即从高加索（指的是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亦即德国进攻的最南面的起始点）延伸往北，经过喀尔巴阡山再到波罗的海。林彪这一见解完全被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的实际路线所证实。

此外，《林彪日记》还收录了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讲话、报告、电报等，尤其是林彪在战争年代的资料十分丰富，很多资料原文照录，如林彪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林彪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方面的详细资料，包括林彪与中央就作战问题往来的电报，林彪对下属部队的指示、要求、讲话等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在纪实林彪元帅生平活动的同时，侧重突出其作为军事家的军事生涯和人物特征，以及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见《日记》下册1224页）

林彪的战略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政治上。虽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规定，过去工作重心在乡村的时期已经结束，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而又兼顾乡村的新时期。《林彪日记》提供的林彪在1949年7月1日所做的报告中则说：“但是华中局根据自己面对的实

际情况及现有的城市工作经验（包括开封、郑州、武汉等地），经慎重考虑，觉得在要正确贯彻二中全会的决议必须在步骤上与东北、华北有所不同。必须首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根据这种精神，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同时以极大力量散布在必要地区，解决支援前线及城市必需的原料与供应问题。这一步结束之后，就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期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匪特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当封建的农村改变为人民的农村以后，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再将各种重心移回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又兼顾农村。”（见《日记》下册647页）这个决定，是因地制宜，而不是机械地照搬七届二中全会总方针。而这个当时华中局的上述方针，主要是林彪提出来的。无论是李先念还是黄克诚，或是杜润生对此都评价甚高。（《坚决执行华中局工作方针，湖北省委确定工作步骤》，载《长江日报》1949年7月4日）据时任华中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回忆，华中局的首次会议一致同意林彪的意见，请示中央的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2—3页）但是此举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遭到批判。

相对于毛泽东的铁石心肠，林彪心存的人道主义无疑是其政治上的软肋。或者说是“厚黑学”不到家。这点在战争年代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作者公布的完整的《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中说到：“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8月初经我部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但城内难民又立即被疏散出数万人……”对于已经出来者，林彪提出“酌量分批陆续放出”。林彪认为：“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敌现进行恶毒宣传，我欲困死长春人民。”于是林彪提出：“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见《日记》上册554—555页）此报告于1948年9月9日上报给毛泽东。但是毛对此没有回音。

作者随后提供了一个重要史实。林彪于是擅自作主，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围困长春的军事首长肖劲光、肖华：从即日起，限于市内市外之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病残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见《日记》上册557页）这毕竟是敌我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建国后，毛泽东等人对于人民的死活更是不放在心上。对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毛泽东非常清楚原因所在。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之后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版275页）但是毛泽东依旧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555页）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而周恩来却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周恩来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56页）这或许可以解释林彪为什么在政治上最后失败而周恩来最终没有被打倒的部分原因。

◇ 重点突出的文革部分

林彪卷入文革运动仅仅5年，在其整体的生涯中也只是极为短暂的一段时期。但是这段时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战争年代的革命活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时期的内容占了全书总体内容四分之一强，可以说是个重点突出的部分。而这一时期也是被官方歪曲最多的部分。举例来说，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不少书籍和回忆都说林彪出席并主持了该会，然而，这些书籍和回忆却说不出林彪何时与会以及林彪在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或作了那些指示。《林彪日记》指出，“12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林彪未参加。”（见《日记》下册907页）事实上，林彪也未参加1966年3月份的北京批罗会议。那次会议是叶剑英受邓小平委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复出，全然不提毛泽东和叶剑英在批罗一事上的作用，而是遵守周恩来定下的调子：“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彪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这不啻是个绝妙的讽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最主要军委领导人。可是国内出版的有关“两弹一星”的书刊丝毫不涉及林彪这位军委主管，似乎林彪对此漠不关心，所有成绩都是周恩来、聂荣臻等人领导下干出来的。《林彪日记》记载：1966年11月，也就是文革轰轰烈烈爆发的第一年，聂荣臻在召集的国防科委研究发展“两弹”的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武器，仍然要贯彻林彪提出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见《日记》下册980页）实际上在1960年2月林彪在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林彪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等。（见《日记》下册727页）如此重要的国防科学技术方针，为林彪首次提出。对于原子弹，困难时期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在少数，可当张爱萍1961年10、11月向林彪汇报这个情况时，林彪坚定地表示：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孟昭瑞《核工业发展50年的巨变：中国蘑菇云》第26节）这说明林彪对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发制造是极为重视的，并对此做过重要指示。事实证明，林彪虽然极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但并未因此而轻视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即使在文革中最混乱的岁月中，中国的国防建设也未停滞下来，“两弹一星”、运载火箭和核潜艇的研制开发依然有了快速的发展，这与林彪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对于军事训练和突出政治的关系，林彪虽然讲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但是林彪还强调了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时间比例应该为三七比。（罗瑞卿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传达《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林总的指示》，1965年1月23日，载《工作通讯》第155期）对于军事训练，林彪一直都十分重视。此外，文革期间地方夺权斗争陷入混乱状态，但是解放军在林彪的领导下一直设法保持稳定，林彪也保护了很多军队干部。《林彪日记》以大量的事实印证了此点。

“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为林彪量身定做了一个主要罪名：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那么是谁最先提议林彪出任国家主席一职呢？《林彪日记》记载说：1970年3月“毛泽东让汪东兴转告林彪，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见《日记》下册1177页）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就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并请叶群转告林彪。毛泽东自己提出国家主席可由林彪来当，但日后却倒打一耙，指责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

#### ◇ 几点不足

要说《林彪日记》存在哪些不足之处，第一，笔者认为，有些非常重要的林彪的讲话以全文公布为好。例如，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笔者所知，国内文献罕有全文公布的，包括在文革时期风靡一时的《林彪文选》以及讲话集之类。而这个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在若干年之后仍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亲历者袁宝华就说：“林彪的报告是2

9日讲的，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为什么说很新奇呢？他说了很多部队里边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他讲了以后，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对他很赞赏。所以30日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还挺感兴趣。因为我们在战争期间都是从最困难处着想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性的话。”而后来颇受争议的“军队骡马化”也是林彪在这次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但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此讲话被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了。如果全文公布，则完全可以澄清这个史实。

其次，笔者以为一些史实的记录还应更准确一些。如1966年8月6日毛泽东要求林彪从大连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派专机接林，吴法宪本人并未去大连，而是在北京机场迎接。此事吴法宪自己的回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皆有明确记载。但是《林彪日记》写成毛泽东“派空军司令吴法宪乘专机去接。”（见《日记》下册932页）“派专机”和“乘专机”仅一字之差，但却是一则史实之误。

此外，在引用他人的回忆时也要考虑该回忆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林彪日记》记载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有关林彪故意迟上天安门和对毛泽东冷面相对，不打招呼，且最后竟然对毛“不辞而别”的情节。《林彪日记》称：“在毛泽东面前迟到早退的事情，过去没有过。”（见《日记》下册1197页）这则说法和判断显然来自摄影记者杜修贤的回忆《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熊华源、安建设《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63—66页）。这则事后的回忆影响颇广，但是却有明显的漏洞，有编造史实之嫌。据张光瑜先生考证，1971年5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张照片，第一张就是杜修贤所称拍到的唯一一张且被日后人们反复引用的毛泽东、林彪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而另外一张照片则是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且毛、林的着装与第一张照片一致。照片的背景为全黑色，显示出是在夜间。照片的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如果这第二张照片是真实的，林彪故意迟上天安门一说就不能成立。那么这一张又是谁拍的呢？如果确有这第二张照片，杜某人所称的“唯一一张毛林照片”说就不能成立。除非人们能够证明第二张照片是假的，并非摄于1971年5月1日当晚。然而，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杜某人的林彪对毛不辞而别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可疑，不可信。理由是（1）记者的活动范围向来就都在外围，不可能贴身靠近毛、林倾听到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谈。中共的纪律极为严格，“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摄影，杜某人绝无可能主动凑近毛泽东与林彪去听他们说些什么。（2）“五一”的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城楼上亦是人语嘈杂，难道这位摄影记者能在这么喧闹之处听到国家领导人交谈些什么，然后确认林彪对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话？其实，杜某人不过就是在外围遛哒，寻机拍个照片而已。（3）我们再来细读一下杜某人的回忆：“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某人当时并未看到林彪是何时离开天安门城楼的，也没有看到林彪离开时是否向毛打了招呼。那么这位摄影记者怎么就能这么肯定地认定林彪对毛“不辞而别”呢？（4）林彪对毛泽东历来毕恭毕敬，公开场合更是如此。即使毛泽东在前一阶段费尽心机整军委办事组，林彪也从未对军委办事组说过一句对毛不满的话。林彪怎么可能在“五一”庆典之时公然对毛不敬，惹火烧身？这完全不符合林彪本人一贯的性格，也不符合林彪对毛泽东的一贯态度。（5）如果林彪公然对毛不敬，毛岂肯善罢干休？可是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毛泽东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与叶群作了亲热长谈，使得叶群铭感五内，事后还不忘向林办的秘书们炫耀。（张云生 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622页）所以笔者认为，摄影记者杜某人的林彪在“五一”当晚故意迟到且对毛“不辞而别”的说法极不可信，确有伪造历史之嫌。至于杜某人在其文中所言林彪迟上天安门是因为要过毒瘾吸大烟，更是一派谎言，编造得如此拙劣。这个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说还能

站得住脚吗？

最后还有一点，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整体过程，《林彪日记》的记载显得过于单薄，应该参考《重审林彪罪案》中渔歌子先生的“林彪文革大事记”，综合几方面的材料，使得读者更能从中了解这一复杂事件的方方面面。

#### ◇ 兼谈另一个所谓的“林彪日记”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香港出版的《争鸣》杂志在2006年的8月号上刊登的一篇署名罗冰的短文：《林彪日记档案揭秘》。该篇短文声称，“林彪生前，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夫人叶群记录，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其跨度是从1964年3月至1971年9月5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本日记一直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这个所谓的“林彪日记”在网上流传甚广，但是仔细阅读即可发现这篇“林彪日记”根本就是伪造，编造得荒诞无稽。

首先，林彪的家人、秘书与林办其他工作人员都否认林彪写过任何“日记”或口授叶群记录过任何“工作札记”。

其次，这个“林彪日记”披露的所谓的林彪的话语明显是伪造的。如1967年1月上海夺权斗争之时，林彪竟然私下里称毛泽东为“B52”。最早出现的称毛泽东为“B52”是1971年3月林立果等人搞出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不过仅仅是林立果与自己几位心腹人士周宇驰、于新野等极小圈子内私下的说法而已，起因是他们观看过一些国外影片，因美国的B52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被称为“空中堡垒”，具有强大的打击能力，故以此隐喻毛泽东。而林彪怎么可能在1967年1月就开始称呼毛泽东为B52呢？

再次，这个“林彪日记”披露的林彪谈话都是典型的故事型的小说家言，如该“日记”称：“1964年3月3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这种戏剧性的言语明显是编造的。再如，该“日记”称：“1969年10月17日，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师也认同我的分析。‘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师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可事实却是，毛泽东已于10月15日去了武汉，林彪在16日去了苏州，林在17日下午口述了六条指示，内容就是针对苏联可能以边界谈判为目的对中国实施的突然袭击，也就是日后的“林副主席一号令”。所以该“日记”所言的10月17日中央会议乃子虚乌有。由此可见该日记编造之拙劣。

海外的一些政论性杂志常常为了批判毛泽东而有闻必录，从不考虑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因此也就不断出现秘闻、秘史，诸如“林彪日记”、“邓颖超日记”等等。这些编造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且乐此不疲。一些普通老百姓往往难于辨识，因而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了。可叹的是，一些较有头脑的知识人，包括一些号称史家的人也真伪莫辨，在写作时大量引用这些伪作，致使其文的质量大打折扣，大受伤害。当然，有些人明知这些内

容似有不妥，但是因为符合自己的需要，在写作时也就宁可相信之，这种人则另当别论。

#### ◇ 《林彪日记》的两位作者

此书作者之一是舒云女士，曾出版有《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和《林彪画传》，还写作了许多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和了解。

《林彪日记》另一位作者——李德先生以往却不太为世人所知，从1959年12月到1964年10月，李德先生曾任林彪元帅的秘书，与林彪元帅有极为密切的接触，同时对林彪元帅也有深入的了解，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使得李德先生更有资格评判林彪元帅。虽然在文革爆发前李德就离开了“林办”，但是“九一三事件”后却无辜受到牵连，与“林办”其他人员一起被关押审查多年。李德先生经历了那段困惑迷惘的年代，然而却能潜心思考中共以往的历史，特别是文革时期发生的各种事件，从而下定决心在退休之后拿起笔来撰写这部林彪年谱。通过编纂这部《林彪日记》，作者希望读者能够进一步认识林彪的一生，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位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共军史，以及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我个人既不属于专家学者，也不专门研究林彪问题，且早已年过古稀，之所以20多个春秋寒暑不辍，如此执着编著此书，全凭曾在林彪元帅身边工作过的80余岁老人的良知……我期望《林彪日记》能为研究林彪军事思想、军事实践和其历史作用，开启一扇扩大视野的窗户。”（见《日记》下册1124—1127页）

对于作者们的辛勤工作和巨大成就，笔者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者的辛苦不会白费，《林彪日记》的出版对于揭开林彪元帅身上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二）

• 舒 云 •

10、256三叉戟会不会像“克什米尔公主号”一样，被定时炸弹炸毁？

关于右机翼上的大洞，有人说，如果导弹直接命中，飞机就粉碎了。飞机没在空中解体，说明并不是导弹打的。也有人反驳，导弹直接命中目标少，一般都是接近目标就炸。弹片磨擦，这就有可能不发生空中解体。

如果是导弹碎片击中，出现没穿透的大洞，有没有可能呢？

可是，为什么洞周围的毛刺，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呢？

油箱内部爆炸的可能性极大，三叉戟机翼两边，各有两个内外组油箱。官方的说法是油箱里的油冲出来发生爆炸，造成大洞。但这个说法很让人怀疑，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造成的爆炸呢？

曾在空军司令部编研室任职、看过空军档案馆全部档案的陆文至大校认为：因为没有中国专家到达坠机现场，现在分析也分析不出问题。总之，256三叉戟的事故原因不明确，飞行

的速度、姿态，都不清楚，分析原因很难。还有没有别的事，只能估计。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始终怀疑，飞机是不正常掉下来的。有一个问题，右机翼的大洞无法解释，是不是内部有什么争斗？但他认为带炸弹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不等于没有可能，这是一个谜，总要猜一猜。在256三叉戟起飞前，有两个人站在右机翼上加油。256三叉戟起飞时，油箱的油盖没有盖上。会不会有人顺手往油箱里面放一个小型的定时炸弹呢？因为256三叉戟右机翼的大洞是出现在机翼的油箱上，所以考虑是往油箱里扔了小型定时炸弹。“克什米尔公主”号就是特务在地面把伪装成中药包的炸弹扔进油箱，造成飞机坠毁。因为小型炸弹威力不大，所以飞机能带火在空中飞行20多分钟，建立空中航线。又因为带火迫降，火越来越大，来不及把剩下的油耗光，只好冒险带那么多的油迫降，爆炸就在所难免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台湾并没有放弃爆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机。1957年，台湾行动特务欧德钦企图入境炸毁周恩来总理的出访专机，从云南畹町入境，即被畹町边防站查获。

其实，飞机飞在天上，一块抹布，甚至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可能成为炸弹。如果抹布丢到飞机发动机里，很有可能造成空中着火。飞机飞在空中，如果出现机械故障，最危险的是发动机着火。五、六十年代的飞机操纵系统都是直接式，只有三叉戟的操纵系统使用了液压助力装置，除了个别飞机可以扔掉发动机外，企图空中灭火是不可能的。

11、蒙古在256三叉戟飞到蒙古上空时，知不知道？

蒙古的官方说不知道，其实蒙古是知道的。1998年2月15日，蒙古原外交部副部长云登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说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低空越境，因为飞得太低，蒙古雷达没有发现。但是因为飞得太低，声音太响，蒙方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

第一次蒙方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交涉时，说“深入”。蒙方到现场勘测后，并不认为这架飞机有对蒙古不友好的行为，否则蒙古外交部也不会邀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到现场视察。

蒙古政府始终没有声明256三叉戟是侵犯！

至于蒙古个别官员说“侵犯”，这种口语并不代表蒙古政府的行为。

无论如何，256三叉戟坠毁蒙古境内的性质，决不是劫机，也不是“侵入”，而是政治避难所致。蒙古政府非常清楚，256三叉戟并没有对蒙古有战争行为。

黄永胜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空防突办副主任，事发时不在，第二、三天他才知道。防突办参谋说，三叉戟越过国境后，蒙古认为突然袭击，中共大型飞机进入我国领空。蒙古顿时乱了套，苏联指挥蒙古军队，找这个找那个，找不到蒙古指挥官。就是一等战备，24小时战备值班，导航台也没有人，塔台也没有人，只是飞行员准备。又是那个点，吃完夜餐，非打瞌睡不行。手忙脚乱，还没找到领导，大型飞机就发生爆炸了。

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回忆：9月12日是我在指挥所值班。值班首长是有情况在指挥室，没情况就回家。夜里12时，我看没事就回去了。回家不久，打电话叫我，雷达看见飞机，查这飞机是怎么回事？这是专机师前一天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航线向北，向温都尔汗飞，过国境就

看不见了。不久李德生到指挥所来了，怎么总政李主任来了？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但不好直接问。说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李德生来一定有重大问题。我叫参谋长梁璞来，一起分析这情况，要不要打下来？也不知道飞机上有谁？也没办法查。李德生心里有数，不说，他请示周恩来，如果把副统帅打在国内，怎么向全国交代？过一个多小时，天不亮，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记功。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问，有没有可能失火掉下来？给大使馆打电话，到现场看。可是不好由我们提。不久，蒙古外交部抗议。我们故意说不可能，那你们到现场看。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官员到坠机现场，看地面不平，撞了，一排人从飞机上掉下来。9月14日，李德生才说林彪在飞机上。

12、256号三叉戟飞越国境后，往回返了吗？

自由撰稿人、澳大利亚汉纳姆采访时，苏联官员告诉他，256三叉戟坠毁时，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

256三叉戟飞越国境后，是不是往回返了？很难说。因为我们的雷达在三叉戟飞出国境后不久就跟踪不到了，三叉戟在蒙古境内的航线，只有靠蒙古和苏联的雷达了。而到目前，蒙古和苏联并没有明确说明。虽然256三叉戟选择迫降是从北向南，而不是它的飞行方向从南向北。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选择迫降场，需要在迫降场上重新建立航线。

但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山海关到温都尔汗的直线距离，按三叉戟的速度，一个小时就足够了，甚至都用不了，为什么飞机飞行了将近两个小时？

山海关到乌兰巴托的直线距离1300多公里，三叉戟飞行时速850至930公里。256号三叉戟在中低空飞行，阻力比较大，航速慢。三叉戟只飞到一半的速度，500多公里。为什么飞得这样慢？机上虽然有雷达，但机上雷达由领航员操作，如果潘景寅又要充当驾驶员，又要充当领航员，他看反射波，不一定能看得懂。潘景寅一个人无法计算准确的航向，又没有地面导航，只能盲目往前飞，所以飞得弯弯曲曲。大方向正确，但具体飞到哪里，心中不一定有数。虽然潘景寅多次飞过这条航线，但没有领航员，又是夜间，没有更多的地标。更何况不仅没有导航的“眼睛”，更没有通信的“耳朵”，他怎么飞？不要说那么大的飞机，就是一个人骑自行车，蒙上眼睛、耳朵，你怎么骑？飞得慢耗时多是理所当然的了。

13、是李作鹏放跑了林彪专机吗？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出台，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的罪证之一是“放跑飞机”。

是李作鹏放跑了林彪飞机吗？否！

1972年4月7日，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赵雅辉、场站参谋长佟玉春、场站油料科科长王学高、场站机械师周振山、场站油车司机刘三儿等五位目击者，联名写出目击材料。

7月2日，这篇目击记被中央专案组收入林彪材料之三，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下发全党。

赵雅辉等五人写道：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的情形。1971年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

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发动！飞机快发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领航员、通信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时32分，强行起飞。

李作鹏获释后，得到一本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文件，他在上面大量批注。在《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影印件原文》上，李作鹏用重重的铅笔批注：

由此可见，并不是由于一人指示可放飞造成的恶果。

李作鹏感谢替他辩护的律师张思之，但他在当时写的一首诗中说张思之边鼓敲几声。张思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其中有一个意思说如果他如果敲鼓中心，他也会被判16年。

律师不敢为李作鹏辩护“放跑飞机”，但其实，“放跑飞机”这件事根本不能起诉，256三叉戟是强行起飞，不是被谁放跑！当然，强加到李作鹏头上的有关“篡改周恩来指示”等罪名也是会真相大白的。

李作鹏虽逝世，但他留下了回忆录，让我们耐心等待！

14、苏联对256号三叉戟如此重视，事前知道吗？

1971年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叶群等从工作梯登上256号三叉戟。海军山海关机场的目击者不知道是林彪，说是一个“秃老头”，一个“胖女人”，都上去了。

九一三事件后，国外传闻纷纷，说林彪并不在坠毁的256三叉戟上。

苏联事前对256三叉戟一无所知。

九一三事件这么大的事情，飞机怎么掉下来？时任新华社东欧组资深记者的杨达洲回忆：1971年9月14日一上班，军代表到《参考新闻》编辑部紧急动员，指定东欧组收听俄语广播，并要求俄语室盯住塔斯社，特别注意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收听敌台是总参三部和广播部门的事情，新华社没有这份业务，这是为什么？很快我们得知中国民航飞机掉在蒙古，再后来知道是林彪座机。蒙古也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国一架民航飞机突然掉下来，也不知道里面是林彪。当时苏、蒙都不知道林彪跑了。最敏感的是西方记者，两三天后发现问题，怎么中国国内的民航机场都关闭了？又很快发现新华社门口墙皮上白底黑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给涂掉了。那些天西方记者老在新华社门口、外交部、钓鱼台、中南海这些关键大门的外面转，写了报道，猜很可能林彪出事了，这才引起苏蒙方面的重视。

1971年，苏联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说：苏联首先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摔下来了？因为不久前，中国对林彪还是大加赞扬的。

所以，苏联人第一次到256三叉戟坠机现场时，并不知道机上有林彪。但很快苏联人发

现，林彪不再露面，黄吴李邱也不露面。苏联马上反应过来，又赶快派人到256三叉戟坠机现场，挖开坟墓，取走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骨。

《真理报》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记者、曾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联络部国际部任职，现任俄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杰留辛说：我们确切知道1941年林彪曾经到苏联治过病，作过牙的模型，有医疗档案，有牙的照片。后来我们派了一批医生到坠机现场，给整个尸体作了检查分析，并拿到林彪当年治过病的医院进行对照，主要根据牙的模型，这才确定林彪在256三叉戟上。

15、256三叉戟的坠毁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关心三叉戟乘机人员死因这件事上，中国最不积极。蒙古人建议是否法医解剖，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坠机现场看后，认为死因十分明显，就是飞机失事，不必再折腾了。双方商量就地埋葬。

在中、蒙、苏三方中，只有与飞机最没有关系的苏联人最积极，几次去现场，并把尸骨带回国研究。据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报道：苏联人说，他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找到了真正的死因。但是苏联人不公布，说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

按苏联人掌握的坠机现场，似乎林彪的死因不是中国公布的因为没油，迫降没有成功。而七、八十年代后，苏联和中国的紧张状态慢慢融化，直到现在成为友好邻邦，完全没必要为九一三事件撕破面皮。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保持沉默呢？

因为死因蹊跷，至今快40年，仍众说纷纭。

英国通讯社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林彪身上有蜂窝般的弹洞。

新华社记者杨达洲说：贝尔格莱德是新华社重点分社之一，1985年我由新华社派驻贝尔格莱德，年底宴请南通社领导。南通社社长沙拉勒维奇与我差不多的年纪，在北京就认识，处得不错。聊到林彪，那时他是驻蒙古和朝鲜、中国三方的记者。蒙古与外国交往很少，难有熟人，南斯拉夫二号人物访朝鲜和蒙古，到乌兰巴托，蒙古通讯社请他吃饭。听到聊256三叉戟的黑匣子，比较关心。蒙古记者的爱人在座，她通中文，是蒙古公安部中文处处长。256三叉戟的黑匣子先在蒙古人手里，后到了苏联人手里，破了。之后蒙方老提抗议，害怕说是它打下来的。这样，蒙古公安部的中文处长才有机会听到黑匣子。

蒙古公安部中文处长说听见黑匣子里有吵架声，有枪声。

杨达洲认为：这飞机一般不会掉下来，判断飞行员潘景寅不同意跑到伊尔库茨克，林立果逼的，应该为烈士昭雪。杨达洲赶紧写了内参，由新华总社发在给政治局委员看的《参考清样》上。

新华社后来驻蒙古的记者王义民说：九一三事件时蒙古没有新华社记者。周恩来总理指示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外电反映都控制在极小范围里。他认为1985年新华社的那篇内参，完全是捕风捉影。

256号三叉戟上发生枪战了吗？

中国到现场视察的外交官仔细看过尸体，尸体上没有发现枪洞。三个机械师和飞行员都没有武器，机上有枪的只有林立果和刘沛丰。林立果的手握着腰上的枪，没拔出来。

苏联退休的克格勃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坠机现场发现的所有的枪都没有发射过子弹。这句话不对，李文普从北戴河到山海关的车上下来，林立果打了他一枪，只不过这一枪打在右前车门把上。

只有这一枪。

1972年，空军五人专家小组分析三叉戟的坠机原因，上边特意让找尸体上的弹洞。曾学过三叉戟修理、时任空军机务部参谋的金华说：我关在地下办公室里三天三夜，仔细看了256三叉戟坠机现场的照片，洞多了，但没有发现弹洞。

16、李德生为什么被派到空军指挥所？

九一三之夜，李德生打着总政治部主任的旗号，被毛泽东派到空军指挥所。

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是林彪提议，毛泽东批准的。可此时李德生也兼着北京军区司令员。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是毛泽东“挖墙角”，“掺沙子”的重要措施。可是李德生先前的总政主任并未免掉，那么应该是兼，谁前谁后？一笔糊涂账。

1971年9月12日中午，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接见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结束后，已经是下午3时多，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个任务，立即从38军调一个师放在南口。南口是北京的战略要地，这是对付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

李德生说：毛主席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

李德生和纪登奎立即回到北京军区，和政委陈先瑞等领导研究布署军队行动。

忙完，这就到了晚上。李德生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时，李德生的心情还没平静不下来，他紧张、忧虑，脑子里一直转着毛主席中午接见时的谈话。他想：斗争还没有完，林彪到现在也没有认错迹象。这场斗争的前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向好的方向转化，还是继续向坏的方向转化呢？

会议进行到晚上10时多，突然工作人员请周恩来接电话。

周恩来一直没回来，讨论停止。

午夜零时后，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小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你赶快到空军指挥所，代替他坐镇指挥。李德生极为震惊，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立即坐车来到空军大院，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

李德生本来是不离开空军指挥所的，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叫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晚上9时李德生回到空军指挥所，笑着宣布：大好事，飞机炸了。这时明确了，但指挥所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256三叉戟上都有谁。正在空军指挥所值班的空军作战部参谋朱秉秀说：9月28日李德生正式传达才知道，西郊机场似乎知道得早一些。9月13日早晨，直升机向怀柔飞去时，吴法宪向在场的专机师领导（时念堂、马兰藻、曹庆章以及标图员）宣布：林彪及叶群、林立果等乘坐的256三叉戟投敌叛国，根据侦听部队报告，飞机已经在蒙古国内坠毁。

17、256三叉戟是不是被打下来的？

李德生赶到空军指挥所时，256三叉戟已经起飞。

标图版上，一条向北的线，过了承德，到了内蒙古上空。李德生不断用电话将飞机的高度、位置、方向报告周恩来。

空军参谋长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256三叉戟的飞行高度3000米，这是海拔高度。实际上还要减去地面的实际高度，当地海拔600米，也就是说，256三叉戟才飞2400米左右。这样低的飞行高度，边境的雷达监视只有几十公里，飞机坠毁到国境线外360公里左右。空军报告：飞机的飞行高度在2500至6500米之间。飞如此之低，就是为了逃避歼击机的攻击。

空军参谋长梁璞多次请示李德生，对256三叉戟采取什么措施？如果将其击落还来得及。再拖延下去，附近机场的战斗机就追不上了。李德生说：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不同意打。李德生再次请示，要不要打下来？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1时55分，256三叉戟飞出国境，下降到2500米，左右拐弯。

2时30分，各条线路同时报告，飞行目标消失。

据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说：在256三叉戟建立的这条航线上，没有设置地对空导弹部队。

这一点担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立果十分清楚。他不会去撞“枪口”。

而且在256三叉戟飞越国境前，空军的歼击机也没有起飞。

就是说，中国没有对256三叉戟采取任何军事措施。

但是，蒙古或者苏联驻蒙古的军队有没有采取军事措施，还是个谜。

18、256号三叉戟野外迫降为什么没有成功？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256三叉戟的失事原因是野外迫降没有成功。

时任空军作战部参谋的朱秉秀认为：抱着一线希望迫降，没成功，摔零碎了。没山丘可能迫降成功，右机翼碰到山丘，那么大速度，顶翻了。先烧后炸，谁也没有逃掉。特别晚上无照

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少。向左偏一点，没准就迫降成功了。距坠机现场60公里是温都尔汗土机场，要飞到那里，油是够的。土机场也比沙丘好，因为三叉戟的两翼与机肚几乎是在水平线上，不适于野外迫降。

空军司令部编研室陆文至大校说：三叉戟有自动驾驶仪，如果地面情况特好，特平，有可能不起火。现在根本说不清，尽量让油少一点，当然不能保证不起火，起码烧不了那么大。为什么迫降？分析飞行员心态不好，思想斗争非常激烈，领航没上去，航线也不正常，又不能不考虑飞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后果。当时什么心态？是不是想同归于尽？如果迫降成功，也表明他不想去。油没有烧干，并不是只有迫降一条路，为什么带油迫降？绕上三圈，油就可以耗一些，把油放掉再迫降，为什么没采取？

现在看256三叉戟出境没想那么周到。潘景寅一个人忙不过来，当时状态很容易紧张。内行人说，这么高速的飞机，又是在晚上，又是在异国，一个人迫降，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成功。确实，这种三叉戟夜间野外迫降，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

曾任空军作战部领航处参谋的刘振华说：当天他不在指挥所值班，事后听说飞机一直飞出去，没有飞回来。运输机是个机组，要有领航员，空勤组齐全才能飞。因为专机有时要自己在空中临时选择航线，如果偏出，领航员要提醒。不像民航，民航是固定航线，地面导航又齐全，上不上领航员无所谓。一般苏联老式飞机还有领航员的位置，美国飞机根本就没有领航的位置，领航员只能临时坐在正副驾驶之间。

朱秉秀说：飞机事先要与机场约好波段，要不通不了话。电台波长知道，调到频率，很容易。

吴德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信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还有油不够了，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

飞行员实施野外迫降动作，没放起落架，打开了前开缝翼。但迫降动作没有做全，没打开减速板，致使飞机迫降速度过大。第一次没爆炸，跳起来，第二次折断右机翼。使馆官员看过现场后说，机翼在飞机降落时，折断了一个，以后飞机冲出了1000多米，机身因此破裂、着火。人可能是被猛烈的冲撞甩出来的，草地上一片狼藉。

如果机组人员全，就可以从容分工。

很多人说：如果领航李成昌在，如果通信陈松鹤在，256三叉戟就会安然无恙。

19、256三叉戟迫降是因为没油了吗？

从蒙古温都尔汗到乌兰巴托29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山海关。对于每小时飞行几百公里到一千公里的三叉戟来说，确实没有几步远了。

当然正在空中飞行的256三叉戟来说，油确实是个大问题，一滴油难倒英雄汉。刚起飞速度不大，仪表上指示的速度与实际速度不完全一样，顺风 and 顶风，以及温度、湿度都会影响到速度。往西北飞顶风，空气密度大。9月风还小，春天飞上海，300公里顺风，那就省油了。平时地面没感觉到有多少风，空中也有100多公里的风，从山海关往伊尔库茨克飞，正是顶风，所以速度上不去，耗油也大。国内随时可以落地加油，可在夜间的国外，你上哪儿加油去？虽然到伊尔库茨克与到广州的距离差不多，林立果没算过这个账，高度、速度都不正常，

三叉戟飞3000米，太低。但三叉戟可以飞到9000米，高度越高，越省油。

空军作战部参谋朱秉秀回忆：256三叉戟非常意外，未知数太多，飞机上有多少油？多少人？什么人？加油、载重、航程成正比，都没有具体资料。李德生坐在那里，指挥所谁敢乱“放炮”？但心里都疑问多多，知道问题严重了。

在山海关机场，256飞机油加进去了吗？

官方的说法是没有。但到底有没有？还是一个谜。因为三叉戟起飞前，两辆加油车正在加油。肯定是加油了，但加进去多少没有公布。先是压力加油，起落架上有个油嘴，小机场油嘴不配套没加上。但还可以重力加油，从上面加，人要站到机翼上去。在三叉戟起飞前半小时，两辆加油车就去了，而且右机翼上有两个人，所以很可能加了油。

朱秉秀说，到山海关，消耗多少油能计算，但山海关油车加了多少不知道。山海关机场没加完油，但加了多少？很难计算。油不能加得太满，太满压飞机，油也不能飞到一滴没有，没油了，马上往下掉。可是油耗不尽，飞机若爆炸，可就不得了了。

山海关加了多少油怎么查不清呢？要查也应该能查，查加油车就能知道。

三叉戟正在往国境线上飞，在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专门问，三叉戟有多少燃油？空中耗油量是多少？根据飞机位置，还有多少航油？还能够飞多长的距离？

三叉戟在迫降时有多少油，这是个关键问题。

官方的说法是潘景寅一个人，没有领航，没有通信，也没有副驾驶，心情又非常糟糕，搞不清飞机的位置，油又不多了，只能赶快迫降。那么，油量不够是惟一的坠毁原因吗？据专家说，油绰绰有余。如果不是没油，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迫降？为什么不把油耗到最低限度再迫降？

1965年6月，第二届亚非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周恩来率团出席。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坐我们自己的专机出国访问。在开会前，他还访问了巴基斯坦、伊拉克、苏丹、坦桑尼亚等国。6月19日，飞往阿尔及尔。刚起飞，空军指挥所接到外交部紧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通知专机返航到开罗，以防不测。因为起飞不久，剩油较多。为了减轻着陆重量，确保安全，专机在埃及飞行指挥中心规定的空域盘旋了半个多小时，耗去多余油量，才安全降落。

很多人判断三叉戟飞到乌兰巴托油是够的，飞伊尔库茨克油也够。为什么掉下来？当时没传达。是机械故障？还是机组人员不愿意，借口油不够？

时任空军作战部领航处参谋的陆文至说：三叉戟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飞机，仪表很完整，无人操作也可以飞到目的地，中途摔下来，怎么回事？按常理不至于在那地方摔。油把人烧焦，油炸的一样，证明还有油。大飞机滑个百八十里没有问题，不是没油，说没油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飞行员出身的空6军副军长薛伦说，油量也够，飞行员技术也挺好，不应该迫降，这真是个谜，正常迫降也不至于这样子。软草地不应该这么严重，散地200多米长，不应该。曾任北空参谋长的方国俊说，中央不是统一口径了吗？依我们飞行员的说法，非正常死亡。

如果还有油，为什么在野外迫降？

(未完待续)

□ 选自“舒云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